

乡村文化治理：场景营造与动能转向

——以浙东S市X村为例

石 伟，韩玉祥

摘 要 文化建设何以撬动村庄发展，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涵。当前乡村文化治理呈现出不同于文化效能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经济价值，即以乡村文化场景营造的方式助力村庄发展。村集体通过文化符号的集中展示、文化活动的密集供给和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来营造乡村文化场景。乡村文化场景的出现，地方政府以治理创新任务刺激，赋能村集体进行文化建设，从而获得密集资源投入，重构了村庄发展方式。就文化建设的治理效能而言，乡村文化场景建设通过回应农民文化诉求促进乡风文明的实现，以文化驱动村庄自我整合推动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运用资源整合的方式转变村庄发展方式。乡村文化治理的场景营造和村庄发展动能的转型，虽然提升了乡村文化振兴水平，但也存在着文化供给的精致化、区隔性和场景化等建设误区。

关键词 乡村文化治理；场景营造；动能转向；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D422.6；G24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25)03-0136-16

DOI: 10.11778/j.jnxb.20240926

发挥乡村文化建设效能，推动村庄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予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濡化功能与社会价值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各地衍生出“以孝治村”“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讲习所”等一大批新时期异彩纷呈的文化建设行为。乡村文化能够深度链接产业、人才、组织等治理要素，助力乡村全面振兴。^①在重塑乡村文化场域、打造乡风文明氛围的轰轰烈烈文化建

作者简介：石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韩玉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建引领农村共同富裕协同治理机制研究”（23BDJ011）。

① 王超、陈芷怡《文化何以兴村：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载《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3期。

设中，乡村文化治理的效能与村庄建设的关系机制需进一步探究。认识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村庄发展推动力量的实践逻辑，是厘清乡村文化治理内涵，促进乡村文化良性、有序供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

（一）文献回顾：乡村文化治理的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

关于文化治理的效能，既有研究围绕文化治理促进村庄建设的实践方式形成双重分析路径：文化的工具性与文化的价值性^①。

其一，文化的工具性，凸显文化治理的政治属性，强调文化作为实现乡村治理的工具与载体。乡村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受社会管理的行政动机刺激，治理主体以乡村文化建设为治理载体的工具理性行为。从学理层面看，文化的工具性缘起于结构主义的文本研究，而后在经验田野中转向实用主义范式的问题分析。早期宏观层面的结构主义范式文化研究，将文化看作是权力运作的社会性展示，文化成为权力要素的组合因素。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从文化要素和权利的互动解释政治。^② 福柯强调治理理念，从权力的支配技术出发，揭示以文化为要素的权力运作，同时将国家意识与形态的宏观话语，转化为个体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日常实践。^③ 本尼特继承福柯“治理术”思想，指出文化的工具价值与实践向度。^④ 文化的工具性，核心是文化建设实践中多元权力主体的互动场域。如乡风文明的实现，需要发挥相互嵌套的多层组织优势。^⑤ 文化作为权力实践的载体，最终演化为乡村治理的抓手，成为现代乡村多元治理路径之一。

其二，文化的价值性，指向文化的社会属性，旨在回应文化供给诉求，发挥文化的涵养功能，促进村庄公共性的达成。但是，乡村文化建设存在行政主导的特征，乡村文化的治理意义脱嵌于“人民中心”的时代价值观中，文化建设同质化、村民参与度较低、供需关系错位。^⑥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突破村庄边界，传统乡土文化被解构，削弱村民的价值认同感与文化理解力，导致乡村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消解。^⑦ 乡村社会内生文化情感与文化系统受到冲击，需要重构乡村文化自信。^⑧ 因而，乡村文化振兴，

① 谢延龙 《“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当代演进与展望》，载《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4期。

②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曹雪雨、姜丽、张跖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185页。

③ [法] 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7页。

④ Bennett, T.,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Grossberg, L., Nelson, C., Treichler, P. A., e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23-37.

⑤ 魏程琳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⑥ 汪倩倩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范式、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载《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⑦ 袁君刚、李佳琦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⑧ 沈一兵 《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危机及其文化自信的重构——基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载《学术界》2018年第10期。

需找回乡村生活的价值性、群众的幸福感,以文化供给侧改革,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重塑乡村文化的认同建构、规范习得和伦理教化等价值与功能,营造出“黏合的心理认同与价值共识”^{①②}。

综上,乡村文化治理的双重路径,反映出文化建设与其他领域相互渗透、相互关联。聚焦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微观场域,乡村文化治理的社会属性表现为文化的价值性,起到村庄社会整合、情感维系、价值共享、意义传递等村庄涵养功能。乡村文化治理的政治属性表现为文化的工具性,即文化作用于治理工具及其体现的权力关系。社会学家鲍曼指出,文化概念是模糊的,它因为各种术语聚合而成的复杂建构。他从复杂笼统的文化界定中,将文化分为概念性文化、实践性文化与结构性文化三类。^③王志弘系统地把组织、经济与社会场域之间的争议与调节界定为文化治理。^④现代治理体系中,文化治理兼具政治、社会和经济三张面孔^⑤。既有研究多从文化的社会性、政治性价值出发,较少关注到文化的经济性价值。因而,本研究立足于乡村文化治理实践场域,基于文化的社会与政治属性,探究乡村文化治理经济属性的实践路径。

(二) 乡村文化治理的经济属性: 场景营造

文化治理的经济属性多见于文化产业发展之中。在宏观层面,文化产业既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又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文化产品也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下,成为商品具有经济价值。聚焦到乡村文化治理实践,文化治理的经济价值较为普遍地显化为文旅融合的形式。通过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带动村庄发展,提升治理效能。农耕文化的传承成为乡村旅游的载体和动力源泉。^⑥但是,其存在的弊端有:一是文旅融合的经济、社会价值凸显,文化价值可拓空间较大。^⑦二是以乡村旅游为主的产业发展,面临过密化的困境,社会公共资源与村庄农民被卷入产业发展中,存在系统性风险。^⑧因而,探索乡村文化经济价值激活的低成本、高收益性,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可为空间。笔者在浙东地区调研发现,村集体通过乡村文化建设,回应农民的文化诉求,提升文化的社会价值,营造文化场景,推动地方政府文化治理的政治效能,获得发展资源,形成政社联动村庄发展的样态。此时,文化建设成为村庄发展的新动能。

乡村文化治理的场景营造,利用文化的社会价值架起地方政府治理任务和村集体发展诉求的桥梁。文化建设发挥着一种良性、有机的传递和链接机制。乡村文化成为

① 徐勇 《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② 杜鹏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载《求实》2021年第2期。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 《作为实践的文化》,苏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5页。

④ 王志弘 《文化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架构的概念性探讨》,载《世新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⑤ 吴理财 《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⑥ 傅才武、程玉梅 《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与政策路径:一个宏观框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⑦ 陈波、刘彤瑶 《场景理论下乡村文旅融合的价值表达及其强化路径》,载《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⑧ 仇叶 《乡村旅游产业的过密化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对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的反思》,载《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村庄社会的媒介。^① 约翰·列维·马丁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文化作为当地情境的方式，提出文化场景化。^② 特里·克拉克在马丁的基础上把文化场景化发展为“作为一种多维复杂体的场景”，并将文化场景的分析维度界定为真实性、合法性和戏剧性。^③ 场景(scenes)，根据日常生活应用体系来看，它涵盖行动主体、行动对象、行动的物理环境(道具等)，形成一个具有意义性和信息性的空间场所以及各个要素之间互动和关联的社会空间。^④ 关于场景的研究，多围绕城市街区，旨在探讨城市街景规划推动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内生动力。^⑤ 本研究将文化场景与文化经济发展的属性聚焦于乡村社会场域，探究乡村社会中文化治理的场景化，它包含文化建设的景观化和文化氛围建设。其中，文化建设的景观化通过文化符号的展示来体现，文化氛围建设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吸纳群众的广泛参与来实现。

二、乡村文化治理场景营造的实践机制

S 市 X 村距市区 20 公里，被称为“丰镇的西大门”，是进入丰镇的必经之地。^⑥ 村庄景色优美，依山傍水，地理位置突出。全村辖区面积 4.63 平方公里，1 016 户、3 270 人，党员 136 名，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因位于丰镇工业园区，就业机会丰富，加之处于全国市场高地，农民家庭收入较高，村内家庭作坊和小规模民营企业较多，为低龄老人提供了务工机会。X 村在村人口较多，村庄社会结构较为完整。2012 年全村土地集中发包，人地关系得到充分释放，农民家庭收入从以农为主转变为以务工或经营性收入为主。2019 年 X 村人均纯收入 3.78 万元，村集体年均收入 80 万元。

自 2013 年成为 S 市 S 区首批建立文化礼堂的村庄以来，X 村进行了密集的村庄文化建设实践。通过打造村庄物理空间的文化符号与用文化活动凝聚文化氛围，X 村营造出环境秀美、文化丰富、乡风文明的现代和谐村庄风貌。因文化建设较为突出，X 村获得多种荣誉称号，远近闻名，成为其他地方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学习标杆。同时，X 村也成为区、镇两级重点支持建设的村庄，获得大量的资源支持，推动村庄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场景营造，是指通过文化活动和文化符号打造，形成以文化空间为载体的文化场景。具体而言，包括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多元主体参与，密集且丰富的文化活动，物理空间建设与文化展示，建立起村庄文化建设的空间场景。

① 沙焱 《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载《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

② Martin, J. L.,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7.

③ 伽·丹尼尔·亚伦·西尔、[美]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祁述裕、吴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8 页。

④ [美] 特里·N·克拉克著 《场景理论的概念与分析：多国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李鹭译，载《东岳论丛》2017 年第 1 期。

⑤ 吴军 《场景理论：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视角》，载《湖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⑥ 遵循学术惯例和研究伦理规范，文中具有明确指称的人名、地名均作拟称化处理。

(一) 空间景观: 文化符号的集中展示

空间景观营造是X村文化治理的核心内容,它通过文化符号空间的场景打造,建设文化空间阵地。X村文化建设活动最早追溯至2009年。当时,村书记向上级争取到3000万元资金打通鱼鲤山脉,修建一座跨河桥,极大地便利村庄与外界沟通。同年,作为区里重点项目,区委副书记主持的一项现场工作会被放到本村召开。因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村庄面貌不佳,又无停车场,展现出来的村庄整体形象不佳,领导对村庄印象不好,刺痛了村“两委”干部。村干部经过协商决定以此为契机改造村庄。原村主任赵某表示,“决定打造村庄后,书记明确了村庄建设基本共识,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以古城风格打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此后,X村最大限度利用上级政策项目,集中布点在郑家堡片区以村委为中心,运用文化符号,打造村庄公共空间,追求村庄空间的风貌。^①主要表现为X村利用各种政策和项目支持建设村委办公大楼之际,动员村内经济能人捐款修建戏台、广场等。2013年村里争取到全区首批文化礼堂建设项目,村内配套集资一部分修建了厨房。而后,村干部一方面借助上级各种项目输入的契机,如宅基地复垦、空心村整治等计划激活村内宅基地资源;另一方面动员村庄返乡群体资助或直接参与村庄建设。在多元开源渠道下,村集体把以村委办公大楼为中心的周边环境打造为具有公共空间、富有现代气息、设施齐全、高标准的公共场地。

空间营造的内涵在于,将公共空间变成具有展示价值的文化符号空间,既营造村庄文化氛围,又回应农民的文化空间诉求。首先,村集体以文化符号和元素打造公共空间,如利用孝文化把弘扬美德的典故、文案镌刻在长廊、戏台等物理设施中。同时,设计村庄的村规民约、村歌、村史等,凝聚村庄文化认同,展示村庄风貌。其次,利用公共场地的橱窗等公示牌,展示村庄的文化活动和精神风貌。相较于其他村庄,X村的公示橱窗相对较长,橱窗除了公示日常的村级财务、决议事项、通知公告外,也会展示村内的好人风貌、村庄的各类评比活动结果公示,以及清晰且详细地标记人居环境整治考核每户得分。同时,在村内运动场边设置了一排村庄风貌展示长廊,专门展示村内举办过的文化活动,如联欢晚会,文化走亲、节日活动等项目中突出的事项。最后,公共空间的建设为村庄文化需求提供了场地,如文化礼堂的建造方便了农户办酒席。老年活动中心、文化礼堂、舞台和运动场的建设,为农民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安置提供了空间。村委办公大楼及其周边,不仅是村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村庄的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

(二) 氛围烘托: 开展紧密的文化活动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且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文化供给的诉求,烘托并营造

^① X行政村由增底山、郑家堡、屈华和后湖四个自然村组成,村委会办公楼、文化礼堂等场地均设在郑家堡片区,并且村庄文化空间建设也集中在郑家堡片区。

出村庄文化繁荣的景象是 X 村文化的核心。在文化礼堂落成首年，X 村各类文化活动全年达 80 场次。此后，正常情况下，文化活动也是每月平均 1 次。据村妇女主任介绍村庄开展文化活动的初衷：“当时文化舞台和文化礼堂建好后，村书记认为，不能让场地闲置，便组织一些活动。”最初，村里利用政府文化部门的送戏下乡项目，组织村民举办晚会。小试牛刀后，恰逢 CCTV 节目组“走进 S 区”推介宣传活动，村书记牵头邀请区里专业舞蹈团队举办“村晚”大型文艺晚会。经过官方报道后，此次活动取得较高的宣传效益，给予村干部极大的信心和刺激。催生村干部举办有规模、体面的排场活动热情，以获得村庄“出名”的机会。随着村庄文化活动规模扩大，参与群体也逐渐增多。但知名度提升的真正转折点是 2016 年举办儿童节活动，该活动邀请学生到村中表演，吸引很多家长参加。

从组织形式和参与群体看，X 村文化活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孝善表彰活动。举办各种“优秀”和“最美”方面的榜样、先锋评比活动，如环境卫生中的最美家庭，最美媳妇、好妯娌、模范丈夫、五好家庭。第二类是以传统文化节日为主的活动。这类活动通常把传统节日的特征与群体需求结合在一起。比如端午节组织集体包粽子，在重阳节组织为老和敬老活动。第三类是大型联谊、晚会类的活动。此类活动是以跨村和联合会演的大型舞台为表演形式，一般是在特殊或重要日子，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每年的“村晚”。此类活动参与人群不仅是本村人，也会邀请其他村的过来表演，以及区里一些专业的表演团队参演。第四类是讲座培训类的活动。通过开展各式各样的讲座活动，一方面丰富在村老年群体闲暇时光，为他们提供交流和参与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宣讲与村民生活相关的内容事项，提升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生活技能，促进老年群体的重新社会化。如邀请妇联开展妇女健康知识和防家暴宣讲，介绍老年人防诈骗、养生与使用智能手机。

（三）组织建设：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

乡村文化治理场景中的行动主体主要是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具体包括村庄积极分子、爱好文艺活动的村民、返乡能人、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多元主体，发挥专群结合、广泛参与的文化建设战线。村庄群众组织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载体，通过强制和互惠方式助推乡风文明实践。^① 村级组织建设为 X 村文化建设提供组织平台与动员机制。村集体在村庄建立非正式组织，为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提供平台，如老年协会。此外，非正式组织亦承担链接村庄外界资源，组织返乡能人的作用。为配合文化活动的开展，确保文化演出的质量，村集体成立专业表演团队，吸纳具有表演基础的群众参加。村庄社区组织的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村庄主体。

^① 程同顺、杨明、李鑫涛 《强制、互惠与乡风文明的养成机制——基于文村红白理事会的实践考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 年第 4 期。

X村在“三师三员”回乡机制下,通过乡贤协会把村庄在外的能人群体组织起来^①,每年春节召开茶话会与在外能人交流、联系情感。这些人是村文化建设有力的支持者和资源供给者,他们成为村庄文化建设的有效推动力量。正如以下三位典型代表:一位是大老板ZPR,给村庄捐了30余万元,目前退养在村里,租用村里土地建造700平方米的大别墅,被村里聘为村乡贤协会的副会长。一位是小老板CJR,为村庄捐了一些钱,自愿参与到老年协会的运作中,被村庄吸纳为老年协会的副会长。最后一位是镇中心学校退休老师曾某,曾某是村庄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村内老年协会以及乡贤协会负责人。老年协会成立于2018年,参与者占村里老年人的30%,经费来源于村里乡贤捐赠。老年协会是开展活动、动员村民的有效载体。而且,老年协会的组织体系与村庄的自然村及村小组是重合的。村内有活动时,村集体通过老年协会通知村民。即除了提供、组织老年群体的闲暇活动外,老年协会还承担着村集体与村民沟通桥梁的中介机制。通过老年协会,村集体动员在村人群,既为文化活动提供“观众”,又为文化活动提供“演员”。

在兴趣组织方面,X村成立两支队伍。一支是妇女主任组织的“魅力X舞蹈队”,一支是CJR组织的民间乐器队。两支队伍成员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参与成员在表演和器乐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村集体也聘请了专业老师指导,文艺演奏水准逐渐超越兴趣爱好式的业余水平走向专业化的水平。此外,参与成员家庭水平处于村庄中等以上,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承担并愿意为专业化的兴趣培养承担成本。遇到镇、区举办比赛时,这些兴趣团体会代表村里参加比赛。

就文化活动中的参与群体而言,X村文化建设涉及人群广泛,既有村内群体,也有村外群体;参与形式多样,既可以作为观众欣赏活动,又可以作为参与者,还可以作为演员参与演出。在上述活动中,很多活动是相互叠加的。比如“文化走亲”的联谊活动,曾举办过同Y市民政局合作的长者慰问活动。除了这些正规活动外,村庄还通过开放娱乐空间,为居民的非正式和日常性娱乐活动提供场地。比如老年群体在日常时间可以到活动室打牌,开放村委的影音室供居民“欢乐唱”。

三、乡村文化场景营造经济属性的建构机制

如何将乡村文化场景转化为村庄发展动能,促进村庄社会发展,成为凸显村庄文化治理经济价值的重要路径。在乡村产业振兴的政策背景下,乡村文化经济价值的激活,通常采用文旅融合的方式,以乡村自然景观、文化风俗等要素刺激村庄旅游业的发展。文旅融合的文化经济价值实现方式,具有较强的市场性,受村庄社会的自然特征、市场距离等要素影响较深。在X村乡村文化建设中,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实现经

^① 三师三员,三师指教师、医师和律师,三员是公务员、警员和银行职员。三师三员回乡服务团是S区建立的通过设置基层服务平台,吸纳返乡的在外能人参与到村庄建设中。

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地方政府通过鼓励村干部构建文化场景，赋予文化场景合法性，激活村干部主动谋求村庄发展，为村庄注入发展资源。乡村文化场景的经济价值是文化成为村庄消费的组织形态与载体，影响村庄的经济活动，构建起村庄发展方式，成为村庄发展动能。

（一）治理创新刺激：文化场景合法性建构

文化场景的合法性建构是文化功能发挥的基础。地方政府基层治理创新的转型诉求，刺激着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转换治理理念，寻求契合治理诉求的方式。首先，乡村文化治理受地方政府文化治理的任务驱动，村集体文化建设的初衷是回应行政任务的诉求。随着当前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入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治理创新的任务压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人民需要的内涵极大扩展，需求层次提升，扩展到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各个生态领域。^②因而，乡村振兴和新时期乡村建设需要提升村庄整体风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在建设“文化浙江”的治理任务驱动下，经过科层层层向基层传导压力，文化建设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文化建设成为浙江省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建设文化强省成为全省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2005 年中共浙江省委在《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提出文化建设的“八项工程”，而后 2008 年审议通过《浙江省推动文化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将文化建设提到新高度。2011 年中共浙江省委通过《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将文化大省转变为文化强省。受治理需求的刺激和治理任务转型压力的影响，科层体制的文化治理诉求成为村干部村庄治理的建设方向。

在地方政府基层治理创新诉求的刺激下，乡村文化建设成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输入，倒逼村集体回应村民文化服务的诉求，完成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任务。此时，被纳入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体系中的乡村文化建设具有合法性。同时，村集体为了凸显治理效能，强调乡村文化建设的场景化，呈现出密集的文化活动、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文化空间的营造等特点。

（二）地方政府赋能：文化建设场景化推动

乡村文化建设获得地方政府的认证与支持，给予宣传推广赋予乡村文化治理的政治效能。基层政府对 X 村文化建设的支持，主要表现为村庄文化建设代言、冠名、宣传推广、资金支持与项目输入。基层政府的代言与冠名，赋予 X 村文化建设合法性，推动村庄文化建设从自娱自乐型的非正规文化活动走向正规性文化活动，形成文化场景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著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0 页。

② 陈晋 《全面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载《中国政协》2018 年第 2 期。

和文化治理氛围。实践中,地方政府为村庄文化建设作出的认证与支持,主要包括运用体制资源对文化建设进行宣传,动员政府部门参与到村庄文化建设,提升文化影响力。

其一,政府动员各部门参与到村庄文化建设中,提升乡村文化建设的正规化水平和文化活动规模,凝聚文化场景内涵。实践中表现为外部力量借助村里文化活动现场,举办工作会议、部门联谊、部门联系群众等活动。^①各级政府为树立X村典型形象,将各类活动或工作推进会、现场会等安排在X村。此外,地方企事业单位也会借助X村的场地举办单位工会活动或单位公益宣讲活动,比如农商行的党建活动、区妇联、区司法局、区教育局的研学活动。这类活动主办方给村里场地使用费,也为村庄做了宣传,互惠互利。

其二,地方政府利用体制资源优势进行宣传、推广,是X村文化建设走出村庄,走向各层级舞台的核心。通过利用官方媒体的各种宣传渠道进行推广,以地方政府赋能来提升X村文化建设的知名度。经过行政体制的认证与扶持,X村文化建设的成效开始被外界熟知。村书记表示“村庄开展大型活动时,需要请区电视台的人参加,区里协调让他们帮忙宣传推广,能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地方政府的宣传与推广,相当于运用体制性的宣传资源,为村庄文化建设认证。

其三,政府项目资源分配方式,成为村集体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在当地村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普惠型项目诉求不高的治理环境中,获得村庄发展类的项目资源成为村干部向上争取项目的追求。而在相对有限的发展性资源体系中,如何分配资源成为地方政府约束村庄与乡镇的有效工具。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对于此类项目资源,采取集中投入的方式。这时,村集体文化场景的建设成效成为地方政府资源分配的指挥棒。

地方政府利用体制资源优势为村庄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推广、运用项目资源分配调动村干部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以及动员职能部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赋予乡村文化建设的外在支持力量。地方政府的赋能行为,推动乡村建设以场景性的方式开展,使得文化建设成为村庄的发展动能。

(三) 发展方式重构:文化场景经济性展演

作为场景的村庄文化建设,何以发挥经济价值,推动村庄发展。在X村的文化场景建设实践中,村庄文化场景的动能激活主要表现为村庄发展主体的激活与多元资源的输入。

首先,村庄发展主体的激活,赋予村庄自主发展空间,促使乡村建设从文化场景

^① 据笔者调研期间不完全统计,来自地方政府支持的文化建设活动主要有:区科协送医下乡,科协科技文化下乡,科协科普文艺进文化礼堂,小百花越剧团送戏进X村,一笑曲艺团送戏下乡,S市S区艺术团文化下乡,浙江C大学艺术团下乡慰问演出,浙江G大学反邪教文艺宣传队走进村庄,S市政协文化“五下乡”活动,区文广局送戏下乡,浙江昆剧团送戏下乡,虞南文化艺术团文艺下乡,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浙江电视台“司法下乡”,区纪委、检察院“纪检谱新篇”联欢晚会;全区文化礼堂才艺大赛(决赛);全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场会;全区机关“乡贤治理、乡警回归”工作推进现场会;全区五星达标、3A争创工作现场,等等。

营造转向村庄全方位的发展。以村庄发展为导向的村庄文化建设,成为行政赋能地方政府村庄经营的载体。^①在地方政府有选择式的项目资源分配下,村干部通过乡村自我建设吸引乡镇政府的注意力,获得项目资源的投入成为推动以村干部为主体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丰镇党委副书记表示“现在千分制考核压力下,区里面对乡镇考核竞争也很激烈,每一分都不能丢,但是又要做出彩才能加分。怎样才算出彩,需要靠村庄搞创新和亮点。乡镇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不能大水漫灌。在乡镇掌握分配权的项目中,集中向那些经验做得好的村庄投放,也激励他们做事。”地方政府的项目资源分配方式赋予村干部以乡村文化建设的自主性。对于那些具有干事创业精神的村干部而言,地方政府的项目资源输入成为村干部进行村庄创建的诱导因素。此时,村干部以及村集体凭借自身组织能力,充分调动村庄社会资源,动员农民参与村庄文化建设。这也是乡村文化建设撬动村庄发展与建设的杠杆。然而,对于那些没有村庄发展欲望或发展能力的村集体,获得的项目资源投入也就较少,村庄进一步缺少发展的动力。项目资源分配的形式,赋予村集体进行村庄建设的自主空间。而这种以文化建设为抓手的村庄建设,受到不同领域的项目刺激时,会产生扩散效果,引起村庄在农业、人居环境等多方面的建设行为。

其次,多元资源的密集输入,为村庄建设提供资源支持。政府密集的资源投入,不仅包括政府体制内资源的支持,还包括经济资源的输入。此外,乡贤群体等社会资源的注入,也为村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和人力资源。其中,体制资源成为推动村庄文化场景建设和村庄发展的核心力量。迄今 X 村共获得各类项目资源投入近 1.5 亿元,涉及交通、道路、管网、房屋和污水等方面。仅村庄固定资产达 4 700 万元。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以奖代补建立物业厂房,每年收租金。现在每年物业收入 40 万元。第二,土地流转部分,村集体借助上级政府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出来,然后由村集体进行土地平整、基础设施提升后,集中连片进行集体土地发包。通过农地的经营,村集体既获得国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剩余经费,又通过主导土地流转与发包获得土地发包的差价。第三,在宅基地方面,村集体通过设置村内宅基地流转秩序与空心村腾退两项计划,激活村内宅基地资源。X 村宅基地流转根据一户一宅的基本底线,村内设置宅基地房屋置换指标。即那些想建别墅的人,而又不符合建房要求的群体,通过把自己的已有房屋与家庭住房困难但是建不起房的群体置换。然后想建房群体把住房困难人员的宅基地上交,向村里缴纳土地平整费,获得用地资格。在这过程中激活了农村宅基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村集体承担着生产经营主体、组织动员和治理主体三重角色。村集体来统筹宅基地分配,强化村民成员权和集体所有权,激活集体事业统筹机制和集体议事机制,也提升了村集体的动员组织能力、协调议事能力和经济统筹能力。空心村整治是村集体动员村民有偿收回老宅基地,以盘活村内宅基地的利用率,为村庄宅基地审批提供可用地。通过

① 石伟 《经营文化: 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村庄经营》,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宅基地置换和空心村整治,既收取部分费用增加集体收入,又通过盘活废旧宅基地进行环境营造。

在乡镇政府项目资源输入的自主空间中,村集体统筹谋划和自主安排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发展。此时,乡村文化被赋予了经济价值,成为村庄发展和增长的可利用资源,促进乡村振兴。不同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村庄价值涵养,也不同于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实践,乡村文化场景营造充分激活村社集体的发展面向,以乡村文化建设为契机,充分调动并激活发展资源,形成乡村文化治理的新模式。

四、乡村文化场景建设的效能呈现

乡村文化场景营造具有经营多重意涵,以经济价值重构文化建设的社会和政治效能,建构起以发展促进治理的乡村形态。乡村文化场景通过乡村文化建设回应农民对文化公共服务供给的诉求,发挥乡村文化的价值涵养功能,提升村庄乡风文明,进而发挥乡风文明重塑村庄秩序的软治理功能。与此同时,经营式的村庄文化建设为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介入农民日常生活提供新路径。但是,乡村文化建设场景化多维价值的联动,在推动村庄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也导致乡村文化的商品化。

(一) 回应农民文化诉求促进乡风文明

组织文化活动释放农民生活诉求,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功能。X村文化场景营造,凭借密集的文化活动,以多元文化供给方式回应村庄中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丰富的文化服务供给不仅满足村庄群体对文化服务的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闲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而且发挥文化的价值涵养功能,促进乡风文明的提升。

首先,多位一体的丰富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乡村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水平。X村文化场景具有多位一体的文化建设特征,以“礼堂—活动—队伍”为载体,空间、活动和主体三管齐下建立乡村文化组织体系。以老年群体为例。老年活动室的建立为老年群体打发日常闲暇时间提供了场所,文化活动和讲座培训的开展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回应老年人再社会化的社会融入诉求。此外,村庄“好媳妇”“孝老爱亲”等形式的评比与示范,树立起示范榜样,营造尊老爱老的村庄孝道氛围。

其次,乡村文化场景具有营造村庄氛围、提升乡风文明的重要价值。一般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建设核心在于回应村民文化诉求、发挥文化的价值涵养功能。乡村文化建设直面变化了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①以文化场景营造方式进行的乡村文化建设,强调文化建设过程中人与物

① 王刚、黄鹏 《公共性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善治逻辑》,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合一建构的文化空间、文明风尚。场景中的各要素有机关联，向感知者传递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通过文化活动形式传递的乡村文化价值与功能，通常是一次性的，对个人的影响是在场的和短期的。农民在文化活动现场短期内感知到文化的涵养和影响，但文化活动脱嵌于农民生活场域和社会交往实践。所以，往往在实践中依靠乡村文化活动为供给形式的乡村文化建设具有不可持续性。然而，乡村文化场景的营造，将乡村文化建设活动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实践，嵌入村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文化的濡化与影响。如X村的五好家庭评选重要因素是家庭人居环境的水平。村庄专门设置了每周一次人居环境检查结果的通报，以红黑榜的形式在村庄公示墙上呈现。此外，村庄文化物理空间的建设，养老活动中心、文化大礼堂、戏台、操场等，形成村庄公共空间，为农民的文化活动开展提供空间，从而使乡村文化建设嵌进农民日常生活、嵌入村庄社会。

最后，乡村文化场景的合法性建构，赋予场景中个体自我表达的合法性。自我表达把场景传递的价值、观念与风尚，融入个人的行动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个体看待事物的方式，个人生活的观念。农民在村庄文化公共空间中的行为实践，既受到文化空间的引导，又塑造并构成乡村文化场景的一部分。最终，以文化场景为形式的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回应了农民文化服务供给的诉求，而且促进乡风文明，引领乡村社会风尚转型。

（二）乡村自我整合推动基层重新组织

乡村文化场景的社会价值具有治理效能，发挥乡村社会软治理功能，促进村庄社会的自我整合，重塑村庄的有机团结。与此同时，受基层治理创新任务驱动以行政力量来推动的乡村文化建设，转变了国家政权建设方式，介入农民日常生活中，从而重新组织基层社会。

乡村文化场景的建构过程，通过激活文化的治理功能，实现村庄自我整合。乡村文化场景治理功能的彰显，以乡风文明社会效能的激活和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动员两方面来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整合。其一，乡村文化场景具有凝聚村庄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的道德治理功能，它包括形成村庄社会规范约束村民行为、建构集体意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等方面。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村集体重新凝聚村庄共识，形成村庄新型社会规范。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熟人规则机制。它讲究村庄社会中交往的非正式性，注重社会互动中的人情亏欠关系、信任互惠关系，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遵循的行为处事原则。因此，对于一些矛盾纠纷的化解、利益协调方面的事宜，村干部不和民众讲法律，反而拉关系、攀亲戚，希望当事人能卖个面子，通过运用村干部的村庄社会权威将矛盾抹平。但是，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松散，个体原子化程度加剧，受市场影响逐渐加深，个体行为趋向于理性理算，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得失，村庄集体对个人的约束能力和整合能力下降，既有的村庄规则被瓦解。随着乡村文化建设活动的逐步开展，村集体通过乡村文化建设，重新凝聚人心，

找回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情感认同。比如,乡村文化空间的打造,文化场景的建构,让村民感知到村庄生活环境的变化,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其二,在乡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过程中重塑村社集体的整合能力。在乡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过程中,乡镇政府通过激活村集体动员农民,做群众工作,使村民认同与接纳规则。乡土精英的吸纳,成为文化与价值落地转化的中介。^①如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在村老干部、在外能人等被纳入文化活动的组织主体,重新凝聚起村庄多元主体的整合力量。

与此同时,乡村文化场景营造的政治价值在于,基层政权建设方式的转型。国家权力通过治理事务,以刺激村社集体进行自主创新的方式,调动村社集体力量。在传统“皇权不下县”的双轨体制实践中,我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形成了以村干部为代理人 and 当家人的自治模式。国家权力通过基层组织约束和吸纳村干部,有限度介入乡村社会。而在乡村文化场景建设实践中,国家权力通过输入乡村文化振兴这一治理目的,并辅之以转变乡镇资源分配方式,输入乡村文化建设制度,调动村干部与村庄农民积极性。乡村文化建设的公共性生产离不开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②在这过程中,国家权力向村庄介入的方式转变为治理任务输入,以乡村文化振兴这一治理任务来推动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构。而文化建设涉及农民日常生活实践,融入村庄社会的日常交往活动。此时,以文化建设为指向的国家政权建构,介入农民日常生活,国家政权建设的边界不断扩展,成为国家整合社会的实践形式。即国家权力通过乡村文化场景营造,在政权建设方面实现以下目标:一是重新整合与调动村社集体的积极性,提升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二是引领乡风文明转型,重塑社会规范,转变农民观念与关系,形塑新农民。三是通过乡村非正式组织的制度输入,以社区组织的形式重新整合散化的个体,建立村社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有机通道,有效实现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三) 整合建设资源促进村庄发展转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面向越来越突出。如何促进村庄社会发展,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形成村庄发展动能,成为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变化。其一,在国家密集资源向乡村社会输入的制度环境和城市化推进程度不断提升的发展环境中,城乡关系出现变动,影响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流动。受城市化发展的程度和空间不断扩张影响,早期进城的群体产生了对乡村浓厚的眷恋和依赖之情。而且城市社会发展压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愿意回到农村社会中,享受村庄的自然风光。其二,乡村社会中人们生活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村庄社会提出更多美好生活的诉求。随着人们生活

① 韩鹏云 《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依据、实践机制与优化路径》,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② 李少惠、袁硕 《源流耦合: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分析》,载《治理研究》2024年第2期。

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在乡村生活的诉求从维持家庭收入增长，到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闲暇生活的丰富、精神文化的满足。受农民村庄生活主要矛盾的变化，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村庄发展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村庄社会而言，村庄社会中有着诸多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但是受村庄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和人口外流的影响逐渐被隐匿。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背景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显化有了空间和机遇。

以乡村文化建设形成村庄发展新动能是以文化场景化的方式激活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属性，以文化的治理性为桥梁，用文化的社会性刺激文化的经济性。就社会发展角度而言，乡村文化的发展动能是通过文化活动、事件和参与等行为，激励行动主体的关注、兴奋、活跃并融入文化氛围中。^①乡村文化场景体现出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活力是乡村社会中社会关系和村庄公共精神的源泉。通过文化场景的搭建，村庄社会的文明风尚以显性的方式诠释，并经过扩散而具有发展效能和经济价值。在此过程中，乡村文化场景的经济价值实现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乡村文化建设以文化场景营造方式呈现，通过可视化的途径显化乡村文化的社会效能。二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扩散机制。乡村文化场景经基层治理创新推动，获得地方政府的认证与支持，具有政治效能。三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机制。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乡村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融合、多元资源融入，以文化带动村庄整体的发展。

乡村文化建设场景化，整合建设资源，推动村庄发展方式转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村庄经济收入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面向之一。在各地的实践中，纷纷形成以土地、乡村旅游、集体经济等多种形式的村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打造乡村旅游景观，发展旅游业，吸引城市居民进村，但是此举效能的发挥受区位因素和地理自然资源的限制。通过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推动农民集中居住，获得土地出让收益，也随着土地财政红利时代的退场逐渐淡化。通过涉农资本下乡，引导土地规模经营，村集体收取租金的方式。受限于资本主体的经营能力，村庄发展失败案例远多于成功经验。以文化建设为形式的村庄发展方式，整合资金、主体的多维力量，构建村庄发展的新模式。在资金方面，整合涉农资源，集中各类项目资源；在参与主体方面，吸纳多元主体参与，通过政绩驱动体制力量投入，引导群众参与，提供市场主体参与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乡村治理的新面向，而且构成乡村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以场景化的方式呈现中，乡村文化场景凝聚文化的多维价值，经济价值激活与乡村文化社会、政治功能的相互交织。但是，乡村文化建设以经济价值激活为表现形式时，核心是用行政力量主导市场体制来推动乡村文化需求供给。这导致文化治

^① Clark, T. N., *Can Tocqueville Karaoke? Global Contras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Arts and Development*, England: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 216 - 230.

理的工具化,文化建设与广大普通农民的文化诉求脱离。乡村文化治理的经济属性实现,将乡村文化给予物化,成为乡村发展实践中可展示的物品,具有可视化、低成本、集成性和展示性的特征。一是可视化。村庄舞台的搭建,村容村貌的整治,环境的改造和道路硬化等变化是可见的。二是低成本的。首先相比于文旅产业或者其他模式,开展文化活动的成本是低的;其次组织者是村干部,对政府来说在村庄中举办活动也是低成本的;最后是项目叠加的效果,不再是传统的投入一大笔资金来搞某一个项目,而是数个项目叠加后的可持续性收益。三是集成性。在文化场景空间中链接了多方资源,如文化局、妇联、公安、检察院等多部门的活动。政府部门亮点工作也可以在这里展演,村集体也能通过文化场景的展演获得场地使用费用,以及获得宣传效益。无形中,乡村文化治理的景观制造会产生意外后果:第一,文化展演将社会群体区隔开来。有钱有闲会玩的村民才有机会加入各种类型的队伍,而普通村民逐渐被排斥到参与体系之外。第二,群众变成了群众演员,村级组织变成了经营者。第三,面临“文化升级”困境,要不断打造新的景观,从而获得持续的多元资源输入,建构起乡村文化治理的合法性。

同时,依靠行政力量利用文化纽带来推动村庄社会自我整合缺乏群众动员,走向应付式被动治理。实际上,乡村存在着公共产品自我供给的社会体制,其不仅具有低成本和保障性的特点,满足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秩序。而市场机制推动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较高的同时伴随着高强度的行政体制动员,具有不可持续性。^①以村庄发展为导向的乡村文化建设,文化供给越发精致,从公共文化活动的供给变成了养生课、花卉种植课、瑜伽课。当面向全体民众的文化供给,失去了文化大众性的面向,开始走向个性化的需求时,文化的公共性也随之弱化。失去公共性的文化建设,虽然一直呈现出繁荣的样态,但是实际上经历了从动员到吸纳,再到展演的过程。

Abstract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Scene Creation and Driver Shift — Take X Village in S City,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HI Wei, HAN Yuxiang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ore and more cultural

① 贺雪峰 《市场—社会二元体制模型与“三农”政策》,载《开放时代》2024 年第 3 期。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such as “governing the village with filial piety”, “cultural halls”, and “new era civilization lecture halls” have emerged. Currently,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esents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that are distinct from cultural efficacy. How cultural construction can drive villag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promoting village development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dopts a case study approach, conduct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X Village, S City in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to examine the practical process,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governance efficacy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promoting villag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 First,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cultural scene creation, making the social efficacy of rural culture visible through visual means. Specifically, the village collective creates rural cultural scenes through the concentrated display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intensive supply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Second, it is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rural cultural scenes gain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local governments and have political efficacy. Third, it is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s, rural society receives intensive resource input, reconstructing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model. Therefor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multiple governance efficacies and enhances the level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by responding to farmers’ cultural demands, reorganizes the grassroots society through cultural-driven village self-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s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model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some misunderstandings such as the refinement, segregation, and scenarization of cultural supply.

This paper reveals a new model of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development in various places, multiple forms of village development models such as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tourism have been formed. Local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collectives have developed tourism by creating rural tourism landscapes and attracting urban residents to the village.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is limited by location factors and geographical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poli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duction, promoting farmers to live in concentrated areas and obtaining land transfer income has gradually weakened with the end of the land finance dividend era.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guiding the land-scale operation, an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collecting rent, it is limited by the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apital subjects, and there are far more failed cases than successful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egrates the multi-dimensional forces of funds and subjects, constructing a new model of villag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scene creation; driver shift; cultur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邹雅嘉
责任校对 王治国